

中华雅风美俗丛书

李春青 李珣平 主编

张海鸥 著

宋 两 雅 韵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华雅风美俗丛书之五

两宋雅韵

张海鸥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160 号

中华雅风美俗丛书之五

两宋雅韵

(全套丛书共八册)

张海鸥 著

*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丰台区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7.5 字数:179 千

1993 年 10 月第 1 版 199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 000

ISBN7-303-03273-8/I·389

定价:5.85 元

中华雅风美俗丛书编委会

顾问	童庆炳	林剑鸣	
主编	李青春	李珺平	
编委	郭英德	谢思炜	张海鸥

总 序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对美的追求，这便形成了时尚。在一个时代文人雅士的艺文制作、言谈行止中往往渗透着一种“风神气韵”，我们姑且称之为“雅风”；在一个时代平民百姓的衣食住行之中，也往往蕴涵着一种风气习俗，我们姑且称之为“美俗”。“雅风美俗”者，人们普遍之趋美避丑之心也。

人是肉体和精神的复合体，人先有肉体存在而后方有精神世界。弗洛伊德氏的学说问世之后，人们便已明了，人的肉体借助无意识的中介而左右人的精神。个体生命是如此，一个时代、一个社会亦复如此。一个特定社会中人们的行起坐卧、相互交往、典章制度、生活方式都必然将自己的影响施之于这个社会的普遍精神。这中间同样有一个巨大的“无意识”作为中介，那便是人们普遍的社会心理。一个时期里，人们都关心些什么？喜欢穿什么颜色、式样的衣服？高兴建造怎样格局的住宅？欣赏什么样的仪表、风度？甚至爱说什么谚语、俏皮话、歌谣，这些都标识着一定的社会心理。“雅风美俗”便是社会心理在美的趣味方面的表现。

“雅风美俗”不是二三理论家提出来的美学观念。她是笼罩在特定时代人们心理之上评品美丑的标准，是人们自觉和不自觉地持有的一种审美倾向。她从不抽象地存在着，而是融汇在人们的行旅宴游中、清淡品茗中、诗文酬唱中、日常生活中。我们正是要通过对可见的行为方式、诗文书画、服饰器物的描述阐释，将那不可见的“雅风美俗”拈将出来，从一个方面窥破一个时代的精神风貌，从而张扬我中华民族在美的文化方面对人类的杰出贡献。

中华民族延绵五千年的文化璀璨多姿，研究和继承先人文化

遗产是我辈责无旁贷的义务。我们构想这套《丛书》，目的正是要为中国文化的继承、发扬尽一点微薄之力。我们以为，研究历代“雅风美俗”对于整个古代文化研究具有特殊意义，因为她是浩瀚无涯的文化海洋中蒸腾的云气霞光，是给默默耸立的古代生活之峰以灵气的烟岚，透过她我们可以重新听到中华民族的先辈们在漫长的历史之旅中留下的足音。

这套《丛书》在内容上以“雅风美俗”为核心，在具体描述阐释上将涉及下列几个方面：

第一，民风民俗。在婚丧嫁娶中、节日庆典中、服饰装潢中、生活习惯中蕴涵着一个时代最普遍的心理，处处显露着对美的向往，对丑的弃掷。例如，唐五代时何以兴起女子缠足之风？这代表了一种什么样的审美趣味？

第二，文人习气。知识分子是时代精神的直接承担者。他们将“百姓日用而不知”的社会心理、时代精神、审美倾向以更明确的方式呈现出来。因此，文人的行为方式、时代风尚、生活态度最能体现一个时代的趋美避丑之风。例如，魏晋士大夫何以喜着宽袍大袖，甚至带兵的儒将也“羽扇纶巾”？不少名士敷粉施朱，效女子之态，这究竟代表了一种什么审美趣味？

第三，典章制度。一个社会的政治生活的外在形式构成一系列典章制度，仪礼规范，它们对时代的“雅风美俗”有极大影响。例如，“汉官威仪”在普通人的生活中造成怎样的影响？科举制度对时代的审美有何作用？九品中正制带来了怎样的社会风气？都大有可言说者。

第四，艺文之作。音乐、绘画、舞蹈、雕塑、器物、书法、戏剧、诗文都是时代审美趣味最直接的物化形式。它们既是一定“雅风美俗”的升华，反过来巩固、强化着一种美的文化和风俗。例如，元明戏曲对百姓的审美倾向就有极大影响，明清小说亦复如此。

第五，经子之学。历代均有阐发玄理、探求奥义之人，都有追问

世界本原、人生真谛之人，诸如儒道之说、佛释之学，或论非常之道，或析人伦义理，诸子百家，各显其时，它们都对一个时代的雅风美俗同样有大影响。例如，儒家精神在人们的生活习俗中是怎样变为美丑标准的？道家思想与寄情山水、饮酒狎妓的文人习气有何关联？这均为本《丛书》所要阐发的问题。

以上五个方面是《丛书》可能涉及的大致范围。但因每本书所反映的时代有远近之别，材料有多寡之分，它们必然依据各自情形而有所侧重，能恪守“雅风美俗”之主旨即可，并不强求一律。

丛书编委会

② 引言

在中国古代史上,宋代是科技、文化比较发达的时代。它孕育了一批学者型的文化人,培养了一代人崇尚博学广识的风气。中华文化历史之悠久、积累之丰厚,唐、宋时代儒、道、释思想之合流,理学之兴起,都引导宋人偏爱哲思理趣。他们极喜欢沉思默想、论古鉴今,苦苦地探讨宇宙、自然、社会历史和人生的大道理,因此,深、博、老(老诚、老练、老辣)便成为一代审美时尚,从而有别于雄汉盛唐。

宋代内忧外患重重。冗兵冗官制度和统治阶级的享乐生活给人民带来难以忍受的经济重负。北方民族的军事入侵和经济掠夺时常给王朝以威胁,给人民带来战乱之苦。具有忧国忧民传统的文人们一面关注着国事和民生,一面寻求拯时救世的途径。北宋庆历新政和王安石变法就是这种心态的反映。然而,中央集权制度的加强,皇室的昏聩和党派倾轧的残酷,无情地伤害着文人们的进取之心,使他们在仕与隐、进与退的矛盾中更偏重后者。但他们并不偏激,他们真正学会了超越执着,抑止悲哀,进退由天,出处从容。因此,“平淡”便成为最流行的审美命题,成为最高雅的人生境界。士人们在文学、绘画、书法等艺术中从容不迫、平和淡泊地寄托高情雅志,寻找生命的价值和心灵的快慰。

华夏审美意识发展到宋代,早已进入官能性“五觉”感受与精神性“心觉”体验并重的较健全阶段。世俗生活中的美意识(有充分的雅趣)充实着人们形而下的体验,而精神生活中的美意识(也有雅俗之别)则慰藉着人们的心灵。宋人比较成功地融汇这两方面的

美意识，实实在在、兴致勃勃地寻觅现实生活中的雅趣，又认认真真、孜孜矻矻地追求精神生活中的雅境。“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衣带渐宽终不悔”。避俗求雅乃是两宋人不懈的追求。

南宋时代民族矛盾尖锐，为华夏文明中的英雄人格意识注入了新的时代内涵，许多文人都是爱国主义者，有的又是民族英雄，他们为民族文化增添了一笔悲壮的色彩。

宋人在政治和军事上的自强意识虽然稍逊于汉、唐人，但其文化的、学术的自信心却毫不亚于汉唐人，甚至于他们的疑古和思辨精神，创新和自主意识比汉、唐人有过之而无不及。这种精神渗透和表现在哲学、史学、经学、文学艺术等各个方面，成为宋代文化自立的内在发动力。

严格地说，宋代的疑古和创新精神不是宋初以李昉、杨亿等人为代表的文人学者们所拥有的。它形成于仁宗庆历年间，此后终宋而不衰。范仲淹等人的庆历新政虽然短命，但却冲击了循古袭旧的社会意识形态。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黄庭坚、杨万里、陆游、刘克庄、陈亮等一批文化人把疑古和创新精神贯注在史学、经学、文学艺术中，而周敦颐、邵雍、程氏兄弟、朱熹、陆九渊等人则在传统儒学的基础上，融汇释、道之学，建立并完善了新儒学——理学。

宋代文学家、史学家、道学家都热衷于向汉唐以来传统经学提出质疑，一场疑古议经，自立新说的风潮便形成了。这就是后人所说的宋学。宋学的基本治学态度是“自我为法，前无古人”。南宋陆游曾说：“唐及国初，学者不敢议孔安国、郑康成，况圣人乎？自庆历以后，诸儒发明经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系辞》、毁《周礼》、疑《孟子》、讥《书》之《胤征》、《顾命》、黜《诗》之序。不难于疑经，况传、注乎？”（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八引）

欧阳修是疑古创新思潮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他不赞成“守经而笃信”、人云亦云的治学态度，他著《周易童子问》、《诗本义》、《尚书本义》，向传统经学大胆挑战。他还对许多传统的经典之作提出种

种怀疑。在他的影响之下，疑古创新精神成为时代的思潮。因此《四库总目提要·经义类》说：“唐以来说诗者，莫敢议毛郑，虽老师宿儒亦谨守小序。至宋而新义日增，旧说几废。推原所始，实发于修。”

两宋文人研究经典著作的新作迭出，新意迭见。“一经之说多至数百家”。王安石、苏轼、朱熹等人都是新解经义的杰出者。朱熹是宋代疑古主义经学的集大成者，也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这两方面在他这里是统一的。宋学的疑古、创新精神影响到整个时代文化的各个方面，对两宋文化自立产生了巨大的作用。

理学是两宋学人对华夏思想文明的新贡献，是中国传统文化继汉文化以后的又一次重建。它是儒、道文化和佛教文化融汇出的新的结果。理学一经形成，便确立了它在中国后期封建社会中的统治思想地位。

欧阳修是理学初兴时的思想家，他认为天理自然，物生有常理。例如，“生而必死，亦自然之理。”理就是客观规律。理的结构有对立，理的内涵不断变化。邵雍进一步明确了天下之物莫不有理（规律）的思想。周敦颐认为理就是伦理道德。他的理学思想虽无大的建树，但其太极阴阳说的思维方式启发了二程和朱子。张载以气言理，认为理统一于气，气是最高范畴。理是气聚散运动变化的条理，也是人际伦常道德之理。理是客观存在的。

程颢和程颐创立了天理论哲学体系，认为天就是理。天是万物之祖，是宇宙万物的主宰者和根源。以天为理，理便不仅仅是规律，是伦理了，它具有了宇宙本体的意义。天理是自然的、无为、无形的，物物皆有理（规律）。因此人们要顺应天理而不能违背它，要通过现象来认识它，理解它。理又具有对立统一性。人伦也是天理的一部分。关于理与心的关系，二程认为心是主体范畴与本体范畴的统一。理是主体心的认识对象，理是宇宙本体。因此，认识理就认识了天下万物。心又是本体范畴，与理、性、命、道的涵义相通为一。

朱熹集理学之大成，构筑起在后期封建社会中具有至尊地位的博大精深的哲学逻辑结构。他认为：“宇宙之间，一理而已。”理是宇宙本体，它无所不在，无时不有。万物之前理已存在，万物之后理仍存在。理是超时空的逻辑实体。但是理又无形无象，是精神实体，但它又必须通过有形之事物来体现。“仁义理智便是天理之件数”。他也重视理与气的关系。理与气是朱子哲学的基本范畴，二者的关系是朱子哲学逻辑结构的基本框架。他认为“有是理必有是气，不可分说”。理寓于气中，气是构成万物的材料，属于物的范畴。理是本，气是末，理为先，气在后。理与心的关系：“心与理一”。“心固是主宰底意，然所谓主宰者，即是理也。不是心外别有个理，理外别有个心。”理又与性、太极、道属于同一层次的本体范畴。朱子还主张存天理，灭人欲。他认为“天理人欲，不容并立”，“去却人欲，便是天理”。

朱熹之后的理学家，有新意的当推陆九渊。他提出“心即理”的命题，把理纳入心中，以理作为心的主要内涵，以心统理。理作为宇宙本体，以主体心的形式出现。心既是认识主体，又是本体宇宙。理是主观精神的实体。理服从心，心是宇宙的本原，理只在心中，并不是独立于心之外的客观精神，这就与他之前的理学有了区别。

理学是宋代学人深思的成果、智慧的结晶。它充分体现了宋人的文化自立精神。

宋代文人把博学、深思、疑古、求新、穷理、淡泊、超脱视为高雅，而把追名逐利、不学无术、浅薄盲从、营营苟苟视为庸俗。避俗求雅是他们最基本的审美倾向。

目 录

● 引 言	(1)
-------------	-----

一 一代风流儒雅的文化人

(一) 博学之雅	(1)
1. 尊儒尚学的帝王	(2)
2. 重文抑武的国策	(4)
3. 勤学苦读的世风	(6)
4. 博学鸿儒应运而生	(10)
5. 简短的结语	(17)
(二) 志趣品行之雅	(17)
1. 儒者的端方耿介	(17)
2. 文人的特立卓行	(23)
3. 平淡——人格美的老成境界	(26)
4. 韵——人格美的潇洒境界	(36)
(三) 雅人三题	(41)
1. 浪子词人柳永	(41)
2. 闺阁才女李清照	(51)
3. 江湖名士姜夔	(58)

二 风流文物属苏仙

——苏轼的美意识及其审美意义

(一) “雪泥鸿爪”话生平	(72)
1. 书香仁爱之家的影响	(72)
2. 政治环境的影响	(74)

3. 人文环境的影响	(76)
4. 平生功业	(78)
(二) 人格美意识及其实践	(83)
1. 功名意识及其实践	(84)
2. 困惑意识和困惑中的追求	(86)
3. 超脱意识及其实践	(89)
4. 仁爱意识及其实践	(92)
(三) 艺术美意识和艺术实践	(96)
1. 精湛的艺术见解	(96)
2. 卓越的艺术实践	(107)

三 正统文学精神的雅化

(一) 宋诗雅化	(119)
1. 内容文人化	(120)
2. 意象抽象化	(123)
3. “以才学为诗”	(126)
4. 高度技巧化	(128)
(二) 稼轩词的雅人格意识	(131)
1. 诗酒风流	(132)
2. 山水雅兴	(133)
3. 古今雅人	(137)
(三) 文学思潮演变中的美意识	(142)
1. 流风余韵	(143)
2. 诗文革新	(147)
3. 苏黄时代	(150)
4. 诚斋活法	(151)
5. 爱国悲歌	(153)
6. 江湖风雅	(155)
(四) 诗话中的美意识	(159)
1. 理学家的功利主义诗论	(160)

2. 厚古薄今的《岁寒堂诗话》	(162)
3. 唯美倾向的《沧浪诗话》	(166)

四 书法、绘画中的美意识

(一) 传情写意,不拘成法	(171)
---------------------	-------

—— 书法中的美意识

1. 蔡襄	(175)
2. 苏轼	(176)
3. 黄庭坚	(178)
4. 米芾	(181)
5. 宋代其他有特色的书家	(187)
6. 宋人的书论	(188)

(二) 丹青难写是精神	(190)
-------------------	-------

—— 山水花鸟画的哲理和诗情

1. 北方山水画的哲思和象征	(191)
2. 南方山水画的诗情与理想	(199)
3. 文人画的意趣	(203)
4. 花鸟传精神	(205)

(三) 画论中的文人意趣	(210)
--------------------	-------

1. 黄休复对“逸格”的推重	(210)
2. 刘道醇的“六要”与“六长”	(212)
3. 郭熙《林泉高致》中的高雅情致	(213)
4. 沈括的“退得天意”和“以大观小”	(216)
5. 米芾的画论	(217)
6. 董道《广川画跋》	(218)

后 记	(220)
-----------	-------

一 一代风流儒雅的文化人

最能体现一个时代审美精神的，就是那个时代的文化人。他们每个人几乎都是一个自足的审美世界，从生活、处世哲学、学术思想和行为、文学艺术活动到出处行藏，全面地体现着其所处时代最高层次的审美精神。

两宋文人审美精神的主要特质是趋雅避俗。黄庭坚说：“士大夫处世可以百为，唯不可俗，俗便不可医也。”有人问他什么是不俗？他回答说：“难言也。”难言并非不可言说，而是内涵太丰富，一时半会儿说不清楚。他举例说：“临大节而不可夺，此不俗人也。”“临事一筹不画，此俗人也”（四部丛刊《豫章黄先生文集》卷29《书缙卷后》）。苏轼自然是他心目中的不俗之人：“东坡道人在黄州时作，语意高妙，似非吃烟火食人语。非胸中有万卷书，笔下无一点尘俗气，孰能至此？”（同上书卷26《跋东坡乐府》）。显然，这只是对俗与不俗的部分内涵的解释。

俗与雅是一对相比较而存在的审美范畴。不俗则可谓雅。苏东坡是当时典型的雅人。

雅与俗的内涵总是因时代、因地域的变迁而变化着。它们的涵盖面极广，从观念到行为，从精神到物质，大凡衣食住行，琴棋书画、人际交往、立身处世、出处行藏……人生的方方面面都渗透着、体现着人们的雅、俗意识。

那么，宋代人的人格观念中的雅、俗意识究竟怎样呢？

(一)博 学 之 雅

雅与俗,是人类步入文明史之后,经过长期文化演进而约定俗成的文明美意识。由于雅、俗的涵盖范围极广,区分雅、俗的标准也就很多。其中,最基本的标准无疑是以学识见闻为主干的文化修养、审美趣味的高下。这个标准随文明进步而日益重要和突出。

宋人的雅人格意识自然也是以博学广识为前提、为基础、为首要内涵。一个人若没有学识,就不可能成为雅人。雅人必须博学。浅陋者必俗,俗则不美,博学广识才可能有雅情雅志,雅意雅趣,雅则美。宋代人比其前代、比其后的元代都更为崇尚渊博的学识。宋代帝王尊儒尚学,宋代政治重文抑武,宋代官制鼓励读书,宋代印刷、出版业的进步为读书和著书提供了大大优于前代的条件。因此,宋代的博学鸿儒较之前代,较之元、明两代数量既多,学识也更出色。

1. 尊儒尚学的帝王

宋太祖赵匡胤出身于武将之家,又生逢五代乱世,因而自幼习武从戎,领兵打仗,南征北战。但他却不是个不学无术的军阀皇帝。他很喜好读书,也尊敬读书人,为两宋君主臣民开了一个读书尚学的风气。据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七引王禹偁《建隆遗事》的记载,宋太祖“性严重少言,酷好看书,虽在军中,手不释卷。若闻人间有奇书,不吝千金以求之。显德初从世宗南征,初平淮甸,有纤人(即小人——笔者注)潜上于世宗曰:‘赵某自下寿州,私有重车数乘’。世宗遣人伺察之,果有笼篋数车。遽令取入行在,面开之,无他物,惟书数千卷。世宗异之,召上谕之曰:‘卿方为朕作将帅,辟土疆,当坚甲利兵,何用书为?’上顿首谢曰:‘臣无奇谋上赞圣德,滥膺倚任,尝恐不迨。所以聚言观览,欲广见闻、增智虑也。’”《宋史·本纪》载,太祖直到晚年仍然“好读书”。这一雅好无疑影响了他的

后代。

宋太宗赵匡义是太祖的弟弟。他一生除戎马征战外，也是雅好诗书，注重文治。这与他的父、兄重视读书有关。《宋史·太宗本纪》载，太宗的父亲领兵“破州县，财物悉不取，第求古书遗帝（指匡义——笔者注），恒饬励之，帝由是工文业，多艺能”，“讲学以求多闻”。太宗晚年自述曰：“朕年长，他无所爱，但喜读书”（《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2，中华书局点校本第三册713页，下简注《长编》卷、册、页）。他在其组诗《逍遥咏·序》中说：“朕听览之余，留心缙帙。《三坟》《五典》，颇识指归，金匱玉函，亦探玄奥”（北京大学出版社《全宋诗》卷23。）

太宗很重视收集书籍。他曾对侍臣说：“夫教化之本、治乱之源，苟无书籍，何以取法？”他“下诏开献书之路，于是天下书复集三馆，篇帙稍备”。又建崇文院，“东廊为昭文书，南廊为集贤书，西廊有四库，分经、史、子、集四部，为史馆书……凡八万卷。”他还注重史料的整理编辑事业。卷帙浩繁的“宋代四大书”的前三种——《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就是他在位时命翰林学士李昉主持编修的。

他喜欢写诗作赋，有时还与臣属一起写作。他率兵灭北汉后，“作《平晋赋》，令从臣皆赋，又作《平晋诗》二章，令从臣和。”继而挥师征辽，途中“作《悲陷蕃民诗》，令从臣和”。太平时节赏花，“令侍从词臣各赋诗。赏花赋诗自此始。”他有时作诗奖赏臣僚：“苏易简续翰林志二卷以献，上嘉之，赐诗二章”（以上引文见续资治通鉴《长编》三571、422、401、624、453、454、575、724页）。

太宗著述颇丰，有《御集》40卷，《朱邸集》10卷，《君臣广载集》30卷，诗44卷。《全宋诗》今收其诗562首。其诗有曰：“大矣哉文，道合南薰。包含六义，洞究《三坟》。”“多知博物，文德心悬。孰能若此，宇宙推迁”（《全宋诗》435页）。

太宗还爱好书法。他说：“朕退朝未尝虚度光阴，读书外尝留